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第三次做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

南次郎与熙洽密谋建立伪满政权的经过……王稔五（28）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金名世（37）

我所知道的日满议定书附件的内容……阮振铎（50）

伪满日本官吏的秘密手册……王子衡（56）

日寇在伪满进行掠夺的三光政策……王子衡（61）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谷次亨（82）

伪内蒙自治军始末……正珠尔扎布（92）

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记要……李泰棻（100）

内蒙德王和蒋介石的关系……陈绍武（114）

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张炳如（139）

日本外务省就汪伪政权成立经过向内阁的报告

……杨凡（译）（174）

汪伪巨奸派系之争……何国涛（182）

附　注：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二七四页

对《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五三、二五四页

我第三次做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

"重登大宝"和初次訪日

"……京津旧臣，開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許之苦心，群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眞相，而終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請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滿，如果关东軍不允許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滿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軍履行前約，他們认为关东軍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沒有照他們的办法去"将"关东軍的"軍"，我早已沒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軍让我辞职，我能到哪去呢？所以煩惱归煩惱，对关东軍的順从还是要順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在一次和武藤的例行会見中，出乎我的意料，他先向我提起了这个問題。他說，帝制的問題在日本

---

* 本文是作者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第六章的几节。

——編者

还正研究着，意見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問題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話，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1933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詩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目倚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搜老翻敎岁月輕。燕市再游非浪語，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遺民見后清"。他不仅要在滿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現"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指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議，到会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議員，在会議上通过了一項"請求实現帝制"的决議。这个会沒开完，就叫日本宪兵給冲散了。但是关东軍司令长官倒也沒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釋說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鉄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覺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順时，有一次发現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驗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賜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現在他又提出这样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說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說日本軍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終也沒弄明白。这年的3月2

日，日軍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領；3月24日，国联通过一項“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議；27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約束。5月31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結束，划定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地带，中国軍队奉命全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眞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憤激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眞地来临，继任的关东軍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訴郑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做皇帝时，我也沒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地高兴，也沒有心思研究它了。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現，是看做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的。在日軍发动长城战爭时，我就幻想过由日軍替我把“大清疆土祉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說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滿意。这时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誰知这套龙袍剛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沒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軍派了人来告訴了郑孝胥，說日本承认的是滿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軍指定的礼服，即陆海軍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統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顧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給我向关东軍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說：“皇上要爭的不該是衣服，倒是应該把君主实权和关东軍說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騎射，也未嘗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慣穿慣的服制，就像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3月1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上，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1934年3月1日)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颚饰和菊花大绶章，給了婉容(我的皇后)一个宝冠章。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那种情绪的起点，那么到1935年4月，我到日本圆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訪日，全是关东軍安排出来的。他們說，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賀，也是为了对"日滿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宫林权助男爵为首組織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員会，派了战舰比叡号来迎接和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連港起舰时，又有球磨、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舰队接受我的檢閱，到达横濱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編队的欢迎。……記得我在这次扭头转向、受寵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　万里远航。

两邦携手，　永固东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了一次七十条舰艇的演习，又在畳船嘔吐之中写下了一首七言絕句：

万里雄航破飞濤，　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岂仅覽山水，　两国申盟日月昭。

总之，还未上岸，馬屁先拍过去。因为我不仅对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惊异，我还把这看做是对我眞心尊敬，眞心帮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只怪自己誤会了。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車站迎接我，为我設宴，然后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了軍队。我也跑到他的家庙"明治神宫"去参拜，給他爸爸"大正"上坟。我到日本陆軍医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又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献殷勤。日本报紙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宮內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是一样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沒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問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为了巴結。

离东京的那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詞說："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滿亲善，是有重大貢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滿意。务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結的心情回答道。

"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誠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現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滿的永久亲善而

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請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謝，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滿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給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中国人味也沒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連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邏輯，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飄飄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請来新任的关东軍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4月29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的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长春的所有簡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訓話，发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我也沒預备讲話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訪日的經过，繪形繪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說：

“为了日滿的亲善，我一定拚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滿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滿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滿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滿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滿洲国皇帝。……”

在5月2日我还頒布了“回鑾訓民詔书”，那是由伪滿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授意，郑孝胥起草的。

朕自登极以来，頃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

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肃敬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迄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眞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禩。钦此！

关于这篇充满奴化毒素的伪詔书的出现，也曾有种种"非个中人不易得知"的内幕。那就是我这次到日本，从东京游历了京都、奈良以后，到了须磨的"武庫离宫"，准备回东北前，当时伪滿国务院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对我說，在"回国"之后，应当发表一篇"詔书"来表示对日本的感謝，并要把这种精神傳告于"全国人民"。（从这里更可以看出伪詔书的頒布，已早經日本关东軍和政府軍部內定。）当我回长春以后，果然郑孝胥便拟出了这一"詔书"的草稿給我看；同时专門操纵我的日本关东軍参謀吉岡安直也替我出主意，說道"在这'詔书'里面，該当添上'依賴不渝和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的字样。"于是我亲笔加上那几句話。吉岡說要写成"依存不渝"，后来因为郑孝胥說这話不通，結果将"存"改为"賴"。从此以后，伪滿的司法和警察机关就有了治罪的一条，叫做"破坏依賴不渝"或"違反与友邦一心一德"。

我从这次对各伪大臣、参議讲話以后，再沒有过这样的随便讲話，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爭，以至太平洋侵略战爭后，对我限制一天比一天严。关东軍指定我会見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議府議长之外，其余的"大臣"們后来只有每年末規定的"政务"上奏（这时还有伪总理張景惠的侍立）和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伪宫举行的形式上的参議府审核年終預算会議以及逢年过节举行庆祝时見見面，再不能如以前的随便来見我。到了太平洋战爭发生后，限制的就更严，連我見亲属也受到限制。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內廷"念书的侄子們之外，关內亲属只准关东軍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其他凡是从华北来的不論是亲属或常亲属都只能在年节与我生日时向我庆祝时行礼，不許个别談話。这是由吉岡安直写在条子上交伪宫內府大臣熙洽照办的。另外"帝宫"里还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瞞不过他們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滿的特制的墨綠色制服，他們的屋門口有一个木牌，沒头沒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軍参謀吉岡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軍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須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吉岡安直的高压电綫

关东軍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岡安直就是傳导性能良好的电綫。

这个高顴骨、小鬍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島人，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虜时止，始終沒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間，他由一名陆軍中佐，步步高升到陆軍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軍高参，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滿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譯成什么名称合适，我始終也沒有认真去查問过。这也沒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論是什么，都不会說明吉岡的实际职能的。他

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連干了十几年，也必須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說，吉岡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軍参謀，正好这时关东軍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軍之間的"联絡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认为他最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間，經常听他給我讲时事，談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絡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軍参謀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說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眞的。伪滿成立以后，溥杰进了日本陆軍士官学校，吉岡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岡必将溥杰請到他家作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这样时間不久，溥杰就听吉岡透露出了，关东軍有請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軍的高級参謀而来到滿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鳥比多吉（任"执政府"的諮議）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沒在关东軍里扎下根，所以全沒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軍高参的身分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絡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請溥杰到他家去作客，請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訴我，并且說希望我能預先为他預备好一間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給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記，我覺得吉岡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沒到长春之前，就給他把屋子預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許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給关东軍看的。他在关东軍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滿官吏"眼里又有关东軍高参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請溥孝胥

題了一首詩，又請我題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給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紙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岡为"采笔軍人"。吉岡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現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給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軍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滿"皇室之間的身价。我从日本訪問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經常不断互相饋贈些小礼物，自然，"联絡人"就是这位吉岡。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臨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閑着沒事，我們又都有現成的作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費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

当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滿"皇室之間，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現了奇迹似的問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們平时就在中国話里夾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談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話說說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音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話录到唱片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滿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覚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們之間的关系的解釋。

1934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后給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說不能以手足論，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們是准親族呀！”

但是到1936年前后，他的話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見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該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話，也由他預先在紙条上写好。每年一次“軍管区司令”会議或“省长”会議的宴会上，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話，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詞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語”：“努力日滿亲善，作皇軍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見什么人、不可以見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寢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誰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沒有了。他这时最常說的話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軍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軍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軍队前綫景况越坏，我的輩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說

的：

“关东軍是你的父輩，我是关东軍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說，吉岡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話也許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計从，向来不敢違犯一句說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軍怀疑我，而关东軍是靠吉岡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軍对我的监視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內亲戚来长春，檢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們連結起来，共謀在关內复辟，这是不符合他們分而治之的方針的。其实，这时我已經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岡后来每天进“宮”极为頻繁，也并沒什么非談不可的事必須見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了說一句什么話，或者忘了問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襲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說他到，我立即接見，尽力減少他等候的时間，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飯，我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見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銅錢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見面給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我的恐惧

經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賬，都在

我裁可的鎮压人民的伪滿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張景惠向来对我不談这些。关东軍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岡安直更絕口不提。我从他們嘴里听到的和"滿洲国通信社"的新聞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蕩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导。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爭的前夕，日本关东軍不但不想再瞞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凌陞案就是一个例子。

凌陞是蒙古的貴族，前清蒙古都統貴福的儿子，他做过張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撫使的顧問，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軍的"滿洲建国元勛"之一。伪滿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剛和我結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訂婚）。不久，我忽然听說他被关东軍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談論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說："前两天关东軍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記得，是凌陞。他勾結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謀叛变，关东軍已經将他正法了。"

"已經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錯了。他的翻譯官連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錯，杀了。"植田也獰笑一下，点头說："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該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岡的意思，告訴人赶快把說好的这門亲事退了。

一連許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說过，日本关东軍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滿洲官員"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軍不放

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連串經历，从進公园被宪兵包圍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許我接見"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軍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覺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話不妙。我怕他說这話是"項庄舞劍，意在沛公"。

后来，給我当过英文翻譯的吳洸业失踪了。听說他被調到駐东京的伪滿使館后，因为和美国使館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再后听溥杰說，这个翻譯曾托监獄的看守带信出来給他，說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兴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續受罪。溥杰沒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轉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頓罵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修济煦愁眉苦臉地告訴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濱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結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細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慘絕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駭人听聞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囑付修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說。

然而我越怕牽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修济煦心神不宁的和我說："咱們的护軍，好像很遭关东軍的忌。"我問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說："沒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覺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修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謂护軍，即在宮內担任警卫任务的軍队，这不同于"軍政部"統轄的宮內"翊卫軍"，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組織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軍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

实力。为了这个目的，熙洽給我从旧东北軍中調撥了一些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內蒙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編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軍官的要求加以訓练。这支队伍成立后，"軍政部"不肯发供給，連枪支也不給，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它，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就遭到了关东軍的忌諱。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可是現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凌陞案，加上佟济煦这一說，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沒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軍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鮮人不肯卖票給他們，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羣便衣的日本人还带着狼犬，向他們动起手来。护軍这次却也給逼急了，便使出了他們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本人的圍攻，而且連狼犬也給踢死了。护軍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車把他們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涼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們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們承认"反滿抗日"。原来被护軍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軍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軍的軍犬。这显然是关东軍的一場預謀。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岡代向关东軍說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軍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陪礼道歉，将肇事的护軍逐出东北，保証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軍又被縮减了編制，繳去了长武器，一律換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換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作了。

应該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設未来的軍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軍，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日本貴族子弟肄业的高級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